

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

2020 秋季號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目 录

编 委 会

主 编：卢丽安

副主编：陈 靛

栏目负责：

文学文化：张 冲

语言学：沈 园

翻 译：王建开

本期编辑：

郑梅侠

编委：

曲卫国 孙 建

李 征 汪洪章

季佩英 姜 宏

姜宝有 郑咏滢

高永伟 谈 峥

褚孝泉 熊学亮

蔡基刚 魏育青

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英语教师提问的互动性差异

研究 杨雪燕 尹顺利(1)

俄罗斯功能语法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对比 姜 宏 赵爱国 曾 婷(9)

体验

——文化视阈下情感集合表量构式的认知研究 仇 伟(15)

文 学

澳大利亚文学专栏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白色批判” 王腊宝 王丽霞(22)

论库切《慢人》中的残疾书写 卜杭宾(29)

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与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走向 陈振娇(35)

多元的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 黄 洁(41)

美国文学专栏

俄裔犹太人的美国之声

——马克西姆·施拉耶尔访谈 李 锋(48)

奥古斯特·威尔逊《匹兹堡系列剧》中的命运共同体书写 吕春媚(55)

论《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的城市镜像与空间阈限 刘 白(60)

小民族文学视阈下奥兹克的礼拜式文学创作思想

解析 张晶晶 田 慧(66)

新旧之辩

——麦卡勒斯之历史意识与南方文学传统 聂玲凤(72)

凯瑟地域小说中的火车与现代性想象 张健然 苏 擘(78)

“肯定生命”

——论《大披肩》的屠犹记忆旅行 郝慧敏(86)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记忆的伦理与记忆共同体 栾天宇(93)

开辟蓝色新疆域 书写库柏新篇章

——评《19世纪美国的海洋帝国想象——詹姆斯·库柏的海洋

书写研究》 苏 晖(100)

英國文學專欄

《霧都孤兒》的空間生產與空間正義書寫 梁曉冬 張慧真(105)

帝國主義的毀他性和自毀性

——論約瑟夫·康拉德對帝國主義的批判 李文軍(112)

欲望、暴力和“午夜媽咪”

——論笛福小說的道德模糊 王曉雄(119)

“中間地帶”的生死僭越

——特德·休斯詩歌中的生命“閹限” 嚴雲霞(126)

伯明翰學派“族裔散居美學”研究 鄒威華 伏 珊(132)

敘事學研究專欄

伊麗莎白·蓋斯凱爾小說中的博物學敘事與階級想象

——以《瑪麗·巴頓》和《妻子和女兒》為例 李洪青(139)

口頭傳統、口頭傳播與口頭敘事

——英語世界口頭文學研究及啟示 李 斌(147)

百舸爭流, 浸明浸昌

——2019 年度中國敘事學發展報告 萬曉蒙 李亞飛(153)

翻譯學

中國當代類型文學在西班牙語世界

——以麥家《解密》西譯本批評與接受為例 程弋洋(161)

文化認同與翻譯動機

——翟理斯英譯《聊齋志異》研究 喬 媛(167)

“雙語”譯筆譜“樂章”

——張旭新作《心田的音樂——翻譯家黎翠珍的英譯世界》

述評 袁麗梅(172)

论库切《慢人》中的残疾书写

卜杭宾
(杭州师范大学)

摘要:《慢人》是库切于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以老年截肢者的失能、被叙述人物的失权、异国移居的失根这三重交叠互补的“缺失”(loss)为文本组构动能,探索了一种独特的残疾书写与阈限诗学。《慢人》是一部慢书、残书,既彰显了后现代实验小说的断裂、震惊、矛盾特质,也体现了库切对老年残疾人群体、小说文本的虚构性、当代澳大利亚“国族身份问题”的深刻省思,看似简单而普通的故事背后实则蕴藏着内在贯通、丰富多维的艺术意涵。

Abstract: *Slow Man* (2005) is J. M. Coetzee's second novel published after his relocation to Australia in 2002. Through the invocation of three interlocking tropes of loss, i.e., the elderly amputee's bodily impairment, the fictional character's non-entity, and the uprooted dislocation of migrants, this text maps out a unique narrative of disability imbued with a poetics of liminality. Although *Slow Man* is in every sense a “slow” and “fractured” book, its seemingly lackluster storyline is actually underpinned by a mutually complement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matrix of intellectual inquiry, which manifests a compelling sense of rupture, shock and contradiction underlying the postmodern experimentation, while also exhibiting Coetzee's profound ruminations on such issues as disability among the elderly, the fictionality of literary text, and “the national-identity business” confronting Australian immigrants today.

关键词: 库切;《慢人》;残疾书写;元小说;澳大利亚移民

Key Words: J. M. Coetzee; *Slow Man*; writing disability; metafiction; Australian immigration

一、引言

2002年10月,当代著名作家库切(J. M. Coetzee, 1940-)因天冷骑车打滑,导致锁骨断裂住院数月。2003年1月,库切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他的一切行动都比以前迟缓了,只能单手打字。坎尼米耶(J. C. Kannemeyer)指出,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次事故是库切创作《慢人》(*Slow Man*, 2005)的直接动因,但库切本人遭受的苦痛必定对这部小说有某种影响(Kannemeyer, 583)。继《伊丽莎白·科斯特洛》(*Elizabeth Costello*, 2003)之后,《慢人》是库切于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作品讲述了主人公雷蒙特遭遇车祸截肢、作者突然闯入、与护工家庭交往等一系列事件的各种阈限体验。这个略显普通的故事没有传统英雄式主角,也缺乏引人入胜的情节,反而聚焦一个老年残疾人的截肢之痛和情欲纠葛。《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中的女主角科

斯特洛在《慢人》第13章的闯入,更彻底打破了前12章给人的现实主义错觉,故事的线性叙事也转变为对小说艺术自我指涉的探讨。

与库切前期作品相比,《慢人》首次描摹了老年人被迫面对主体残缺与丑陋时的极度崩溃;其次,通过作者闯入文本的元小说手法,将身体残缺与文本真实幻象的瓦解巧妙衔接;最后,围绕老照片的原作与复制品之争,将残疾主体与当代移民的失根现状置于共轴维度。《慢人》以残疾和缺失为文本组构要素,始终使读者处于一种延宕未定的边缘情境,而在见证雷蒙特身为残疾主体、被叙述的虚构生命、孤独无根的跨国移民这三种交叠错位的阈限体验中,这个看似简单乏味的文本也嬗变出丰富深刻、互相补衬的思想内涵。

二、老年截肢者的失能

小说开篇,突如其来的车祸和截肢事件彻底改

变了雷蒙特的人生,使他被迫面对丑陋不堪的“残缺自我”(Coetzee, 2005: 17)^①以及死亡阴影下生命的脆弱本质,并在医疗话语的强行介入后体悟到老年残疾主体饱受贱斥与屈辱。库切曾说过,身体是贯穿他小说创作的一大标准:“身体是‘它所是’的证据在于它感受到的疼痛。疼痛的身体构成了对无休止疑虑的反抗……不是人赋权于苦难的身体,而是苦难的身体自身取得了这种权威:那就是身体的力量。”(Coetzee, 1992: 248)库切前期作品对身体书写的关注,往往将小人物塑造为权力压迫的客体或是南非殖民暴力的隐喻,《慢人》则跳脱了后殖民的论述框限,转而关注老年残疾主体的失能苦痛与身心感知。

雷蒙特遭遇的车祸是文本铺展的一个重要起点。《慢人》给人的巨大震撼无疑始于开篇的这段描写:

撞击从他右边忽至,那么剧烈,那么猝不及防,那么疼痛,就像遭了一下电击,把他从自行车上撞飞了。放松!当他在空中飞掠而过(以最轻松的方式在空中飞掠),他这样告诉自己,的确,他能感到四肢听话地松弛了。像只猫一样,他告诉自己:打个滚儿,然后四脚跳跃,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个不同寻常的字眼轻柔(*limber*)或敏捷(*limbre*)也浮现在眼前。(1, 黑体字英文原文为斜体)

在第三人称“他”和“他这样告诉自己”等模糊的指称转换中,读者不确定是谁在描述车祸现场,谁又是这次事故中被凝视的客体。是故事的叙述者?还是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抑或是后文突然出现的科斯特洛?实际上,开篇对雷蒙特轻盈腾空的戏剧化白描,读起来甚至不像车祸现场。此外,第一章一直用“他”指代雷蒙特,读者要到第二章才知晓这次事件的伤者名为保罗·雷蒙特,并在回读的过程中惊觉开篇描写的是一场车祸。小说伊始就以碎片化的短句和慢镜头的方式,定格并拉长了车祸发生时的恐惧、威胁、冲击,充满了一种思维停滞的张力,更暗含了一种全新的感知模式。

因车祸截肢的雷蒙特被剥夺了主体完整性和自主权,而他在医院的治疗也导致了其老年身体异化为医疗福利体系的权力运作场域。在年轻医护人员看似和蔼可亲的“利落和高效背后”,雷蒙特窥探到了一种对患者命运的“终极冷漠”(12)。雷蒙特认为,他被迫截肢以及医护人员的冷漠,归因于他们这

一特殊群体的年纪,“好像在某种无意识层面,这些派来照顾他们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已经没什么可以贡献给这个种族了,因此他们无足轻重”(12)。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相比,老年身体的他者性被赋予了一种否定意味,老年残疾病患更是如此。因此,被归为老年人的雷蒙特自动被医生剥夺了腿部再造的机会,并受到以年轻健康话语为主导的潜在歧视。

除了在医院里亲眼所见的“终极冷漠”,失去自理能力的雷蒙特被迫在普茨太太的安排下接受护工的照料。大卫森(Michael Davidson)认为,老年残疾人的处境凸显了身体照料和依赖的重要作用,“依赖对于残疾人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对于很多健全人(able-bodied persons)而言,残疾就等于依赖”(Davidson, i.)。在普茨太太的硬性安排下,雷蒙特再次觉察到了正常人的游戏规则对边缘群体的宰制,因为“普茨太太是福利制度的一部分。福利意味着照顾那些无力照顾自己的人”(22)。在《慢人》中,现代国家福利制度对老弱病残者的医疗照顾并非一种感同身受的伦理关怀。任何被界定为“失能”之人都必须接受“正常化”话语的矫治措施和身体规训,从而在残疾人与正常人的二元对立中实现对异质他者的管控、监督、甚至是清除。

雷蒙特的残疾成了人生悲剧的开始。小说以大量篇幅聚焦雷蒙特出院后的身心痛苦与死亡意识。出院后很久,雷蒙特仍无法接受截肢的事实。全书遍布了各种对残疾身体的丑陋、怪异描写,例如:“这个裹着白布的怪物”(9)、“受伤肌肉幽灵般的蠕动”(11)、“齷齪缩小的大腿肌肉”(33)、“混乱萎缩的大腿、松弛的肌肉和不堪的小肚子”(38)。在一系列极具负面意义的表述中,“丑陋”(ugly)一词在全书共出现8次,“齷齪”(obscene)出现4次,“怪异”(monstrous)出现2次。雷蒙特认为,“对他而言,他不叫它残肢(stump)。什么名字他都不想叫……如果他给它起个名字,那就是大腿(*le jambon*)。叫它大腿,就可以对它敬而远之”(29)。颇为有趣的是,全书中*jambon*只出现在这一处,而雷蒙特回避的stump却出现了近20次之多。小说中有这样一幕:雷蒙特因为洗澡跌倒,疼痛之际尿在了地板上,幸好护工玛丽亚娜之子德拉戈及时赶到。雷蒙特提道:“如果说他不再在玛丽亚娜面前遮遮掩掩,那是因为他已经在她面前够贱斥(abject)了。”(214)此处的“贱斥”一词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雷蒙特对残疾躯体的极度恐惧与厌恶。

^① 下文凡引自《慢人》原文,只标注页码,不再另注。

以贱斥 (abjection) 理论著称的法国思想家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认为,“贱斥”是一种基于身体差异的他者性,不仅指向一种对常规的偏离,还暗示了对被贴上“贱斥”标签之人的污名机制:“贱斥内部隐藏了一种剧烈、黑暗的反抗存在体,针对的是一种似乎源自强大的外部或内部的威胁,因为超出了可能、可容忍和可思考的范畴而遭到拒斥。它就在那里,很近,但不能被吸纳。”(Kristeva, 1) 雷蒙特对自我的贬损和对残缺身体的厌恶,肇始于车祸导致的主客体界限消失,以及意义崩解后面对于贱斥威胁的恐惧与绝望。虽然雷蒙特竭力排斥残肢这一贱斥之物,但是作为“我”对立面的贱斥之物并不就此消亡,因为他不愿正视的贱斥之物恰恰“来自他的身体内部,属于他,是他的一部分”(52)。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贱斥之物的存在,雷蒙特不得不面对自身的丑陋不堪,尤其是衰老和死亡的残酷现实。

雷蒙特的生命悲剧与其说非个案,毋宁说是残疾人体的真实写照。正如雷蒙特所说,“眼睛是一种彻底的残疾。一个看不见的人是次等人 (lesser man), 正如一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是个次等人,而不是一个新人”(113)。虽然以平等关爱为口号的医疗福利体系让残疾患者遗忘过去,借助科技设备矫正残疾、自觉融入新生活,但这种体系并不考虑残疾者的身心痛苦。在这部以老年残疾人为叙事主体的小说中,库切不仅细致呈现了伤残主体面对贱斥身体时无可慰藉的极端苦难,更饱含同情地表达了对残疾人被他者化、边缘化、污名化的现实批判。

三、被叙述人物的失权

雷蒙特的残缺不仅是身体的残缺,更是传统虚构人物/主体的叙事失权。从一开始雷蒙特截肢后拒绝安装义肢,到他陷溺于对护工玛丽安娜的情欲纠葛使故事无法前进,《慢人》的身体和文本是互相渗入的,而《慢人》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义肢化 (prostheticized) 的故事 (Hall, 125)。雷蒙特身体的残缺不全使整个文本的内在意义也随之支离破碎。在作者突然闯入的元小说跨层设计中,《慢人》既展现了人物被书写与被宰制的命运,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激活了作者与人物矛盾共生的思想张力。

科斯特洛的突然闯入使作品的真实性与虚构性歧变出三种可能性:①科斯特洛意在将雷蒙特写进她正在构思的作品;②雷蒙特已经死亡,他和科斯特洛的相遇是一种来世体验;③科斯特洛进入的是她自己建构的叙事,而雷蒙特是她笔下的人物。如果说前两种可能性仍是将雷蒙特视作现实主义小说

典型环境下的“真实”人物,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则揭示了《慢人》的元小说本质。当科斯特洛开始背诵小说开头的“撞击从他右边忽至,那么剧烈,那么猝不及防”(1)时,前12章营造的现实主义式幻镜突然碎裂,原本的虚构变成了虚构之后的又一次虚构。这种破坏叙事边界的跨层 (metalepsis) 使叙事世界的语义场失去了独立性,只可能发生在虚构型叙述中。跨层奇幻怪异、充满讥嘲,而追求“现实主义”效果显然并不宜用跨层 (赵毅衡, 146)。库切一直对现实主义标榜的幻象主义 (illusionism) 颇有微词,而元小说对库切而言是“一种对失败的超越性尝试的记录,或者,为了抵抗,可以通过借用游戏的各种概念,尝试将瘫痪转化为裨益” (Coetzee, 1992: 6)。《慢人》的文本身体 (textual body) 逾越了现实与艺术、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文本跨层与自身意义的内爆中,既体现了库切对现实主义式和谐欺骗叙事的批判,也实现了肢体之义与文本之义的缝合。

其实,《慢人》文本的自我指涉在前几章就已出现。例如,小说开头有一个夹杂了斜体与字母的奇怪段落:

发生了什么? 如果他睁开眼睛,他就会知道。但他还不能那么做。有东西正朝他而来。一次一个字母,咔嚓咔嚓咔嚓,一条信息正敲击在一块玫瑰粉色的屏幕上,他每次眨眼那屏幕就像水一样颤抖,因此很可能是他的内眼皮。这些字母显示, E-R-T-Y, 然后是 F-R-I-V-O-L, 然后是一阵颤抖, 然后是 E, 然后是 Q-W-E-R-T-Y, 连续不断。愚蠢无聊 (Frivole)。 (3)

这段话看似是雷蒙特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的错乱梦呓,然而读到后文的“毫无意义 (FRIVOLOUS)。那天在麦吉尔路,他多么费力地注意那个众神之词,在他们玄妙的打字机 (occult typewriter) 上敲打出来!” (19); “我的人生似乎毫无意义” (frivolous) (83); “他眼皮后面被那台天际的打字机 (the celestial typewriter)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出来的称号,是弱小 (puny) (123)”等一系列字句时,再回头重读对照,就会愕然发现这几个异样的大写字母,其实是电脑上的键盘字母,而雷蒙特遭遇车祸、接受治疗等情节也变为了科斯特洛编织故事时敲打键盘的动作。正如有评论所说,“这些字母 Q-W-E-R-T-Y, 回返至第一行的开头以及键盘第一行的几个连续字母……因此它言说了各种开始、书写的原材料、意义生成所在世界中的真实之物,以及从保罗的观点看来,言说了通过书写而生成为一个人物的困难之处” (Wicomb, 9)。《慢人》文本的自我回指不断提

醒读者,保罗身体的原材料是借助电脑键盘等输入设备才得以生成,正如他的眼睑变成了某种内嵌的“玫瑰粉色的屏幕”(3)。除此之外,《慢人》的另一个互文性指涉是英国作家福尔斯(John Fowles)的经典元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69),两本书中作者突然闯入文本都发生在第13章。

科斯特洛主动闯入文本叙事,体现了上帝般全知全能的作者权威,也如飞来横祸再次击碎了雷蒙特原以为的生命完整性与自主性。科斯特洛对雷蒙特的一些想法和其他人物的背景似乎了如指掌,而雷蒙特始终觉得她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那种感觉并没有离开他,他只需俯身,他的手指就会碰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112),甚至觉得自己像木偶和“斗兽场里可怜的老熊困兽”(236)一样,“她发号施令,我们听命。即使没有人看我们执行”(111)。《慢人》一方面揭示了小说人物丧失叙述自主权、实为被虚构生命的陌生化反差,另一方面也在引导读者省思作者对笔下人物的伦理责任。实际上,即使在科斯特洛闯入文本叙事后,雷蒙特依然深陷与玛丽亚娜一家的纠葛,这反而令科斯特洛手足无措、创作举步维艰。《慢人》的重点并不只是为了“质疑叙述的随意和虚假”,而是“更多地在探讨一个道德问题,即小说作者虚构人物,并给他们设置重重考验和磨难来揭示他们的性格缺陷,这样做是否道德?”(Lanchester, 2011)塑造雷蒙特这一人物,其实不符合科斯特洛的个人意愿。科斯特洛最初见到雷蒙特时就多次提道:“是你找上我的,在某些方面,我没法控制来找我的东西”(81);“是你找上我的,我告诉你:那个腿脚不利索的男人”(89)。多次出现的“是你找上我的”似乎暗示了科斯特洛在构思之初就无法完全掌控人物与叙事的导向,反而使作者陷入一种创作危机和受制于笔下人物的书写悖论。在人物拒绝合作、故事停滞不前的创作僵局中,作者态度的软化似乎成了唯一可行之道。库切在小说中赋予了科斯特洛和雷蒙特同等重要的言说权利,而人物与作者之间也最终变为了“你派来找我,我派来找你”(161)、“保罗·雷蒙特只为我而生,而我只为他而生”(233)的辩证关系。

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认为,库切使人无法确定小说的真正焦点:是一个残疾男人的震荡生活,还是一个小说家对笔下人物的艰难操控,似乎这两种叙事兼而有之(Attwell, 221)。从残疾书写到文本自我指涉,《慢人》在作者上门寻找人物的陌生化情境中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和谐幻象,而在人物醒觉、自身生命的虚构性以及叙事自主权丧失的过程中,

作品也重新定义了作家与人物互相依存、矛盾共生的书写伦理。

四、异国移居的失根

英国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想象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 1991)中说过:“移民可能是20世纪的核心或决定性角色。”(Rushdie, 277)从车祸造成的身心碎裂,到成为被叙事人物的权利剥夺,《慢人》以“缺失”为组构要素的文本内核还体现在雷蒙特对移民失根之痛的体悟以及对澳大利亚当代移民现实的反思。

雷蒙特的父母是法国人,父亲死后母亲带着雷蒙特姐弟与现任丈夫移居澳大利亚,如今只剩他一人寡居澳洲。萨义德(Edward Said)认为:“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萨义德, 45)历史的迁徙导致个人的生存错位,而身份疆界的模糊使雷蒙特无论身处何方都成为精神上的流亡者。从离开法国移居澳大利亚,再到离开澳大利亚重返法国,最后又从法国回到澳大利亚,这三次从童年就开始“被连根拔起”(uprooted)(192)的特殊经历成了他沦落天涯的失根与创伤之源。在法国亲戚中间,雷蒙特“总是个不合群的怪人”,他们直呼他为“英国人”(196)。雷蒙特对澳大利亚也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他坦言:“我可以装成是澳大利亚人,我装不了法国人。就我而言,国家身份那种事(the national-identity business),就是那么回事。”(197)此外,从6岁移居之初他就面临非母语的客观现实,加上家庭因素与外在环境,以及雷蒙特天生的格格不入之感,这些伴随异国迁徙的一系列创伤、错位、陌生体验都使他的语言无法达到自然流露的母语水平。可以这么说,雷蒙特因车祸导致的身体残缺,始终贯通着他精神上的无家之感和身份归属的缺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雷蒙特开始大量收藏澳大利亚早期矿营生活的老照片。雷蒙特固然希望通过收藏照片、保存历史,实现与澳大利亚集体记忆和国族身份形塑的某种想象连结。然而,面对老照片映射的早期移民的艰辛生存,雷蒙特再次意识到自己在澳大利亚正统国族历史中的尴尬身份:“一个有着他们自身故事的民族,一段过去。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过去。但那是真实的吗?那个照片中的女人会把他视作她部族的一员吗?……他想宣称为他自己的那段历史,难道最终不就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事情,外国人(foreigner)都被摒除在外吗?”(52)正如鲍威尔斯(Donald Powers)所说,正是因为雷蒙特

害怕像早期移民那样在后人的凝视前变得僵硬、匿名,甚至消失在历史中,所以老照片成了他收藏的灵感(Powers, 462)。一方面,身为外来移居者的雷蒙特很想融入早期移民所代表的宏大历史叙事与国族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他又隐约感到自己的他者身份似乎无法为早期移民代言,因为早期移居澳大利亚的大都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而不是法国人之类的所谓“外国人”。

与雷蒙特收藏老照片息息相关的一大事件,无疑是在《慢人》的后半部分,玛利亚娜之子德拉戈利用电脑合成技术将其中一张老照片替换成了他爷爷乔西奇老爹的头像。正如科斯特洛的闯入令雷蒙特原以为的真实生命变得碎裂、虚幻、荒谬,对于雷蒙特索要原照的要求,玛利亚娜的回复也再次颠覆了雷蒙特关于真实与虚构、原本与复本的认知偏见:“原照?你指照相机,咔嚓,你做了一个复制品。照相机就是这么工作的。照相机就好像复印机。那么,什么是原本(original)?原本已经是复本(copy)了”(245)。玛利亚娜关于“原本已经是复本了”的论述,一针见血地捕捉到了原本和复本之间流动不定的模糊界限。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多许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品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本雅明,10)。借助现代电脑科技的机械复制技术,“原本”不再拥有绝对权威的,而是以一种恣意裂变、无限衍生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事物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同时以一种逆向书写引导我们反思以德拉戈一家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当代移民的现实处境。

科斯特洛曾提醒对原照怀有执念的雷蒙特:“德拉戈也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德拉戈觉得,在国家历史里插入一个乔西奇家的人,有什么要紧的呢,即使插入得有点过早,比如说乔西奇老爹?”(220-221)小说原照之争的吊诡之处在于,“当伪照以他家人的脸取代了原先照片里那人的脸,伪照反而呈现了当前社会现实的特征”(Boehmer, 12)。雷蒙特专注对老照片的守护,却忽视了外来移民群体亦是当代澳大利亚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满怀憧憬来到这个“充满机遇的阳光之地”(66),非但没能获得一种自由追求理想的归属感,反而深陷难以继的生存困境。在《慢人》中,难民玛利亚娜移居澳大利亚前曾在德国杜布罗夫尼克美术学院主修古画修复专业,到了澳大利亚后只能从事繁重琐碎的护理工

作。她丈夫乔希奇擅长古代机械技术,他重装的一只历经百年的机械鸭子后来成了杜布罗夫尼克美术学院藏品中的精品,然而“在澳大利亚没人对他和他的机械鸭子感兴趣,他只是家汽车修理厂中一个寂寂无名的汽车工人”(86)。小说透过科斯特洛、玛利亚娜、德拉戈等人之口,不止一次强调他们夫妇在澳大利亚被迫转行的生存重压。玛利亚娜的儿子德拉格想上堪培拉的寄宿学校,科斯特洛却指出,“为了进这个学院,他们要面试那个男孩和他父母,但主要是父母,为了确保他们是对路的人”(94)。此处“对路的人”显然是指澳大利亚盛行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在以英裔白人为主导的主流社会看来,白人生来高人一等,理应享有教育特权,非白人移民则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和劣等性,因此主流社会必须对作为他者的外来移民进行严格筛选,才能让他们放弃原有的母国身份认同,接受并内化移居国的主流价值观。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雷蒙特是一个毕生都在迷失自我、徘徊于生死边缘的“精神截肢者”(spiritual amputee),三次流亡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对人类现实生存完全陌生的人(Eagleton, 1917)。实际上,《慢人》中截肢所隐喻的失根错位、精神创痛并不只适用于雷蒙特一人。小说结尾曾点明,虽然雷蒙特因截肢失去了一条腿,“但是过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或多或少失去了一条腿。你失去的一条腿只是一种标志或符号或症状”(229)。从这一意义而言,雷蒙特与乔西奇一家共同构成了澳大利亚移民群体的现实缩影。他们被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价值观影响、形塑,惨遭残酷现实的无情倾轧,在“非家”(unhomely)的异国泥沼中逐渐同化为“新人”中的一员。由此观之,开篇雷蒙特遭遇的车祸,不啻两种文化撞击的隐喻。迟缓骑行的老年人雷蒙特象征了弱势的移民文化,而飞速奔驰的年轻人布莱特则代表了强势的主流文化。相比身体残缺的外在表征,移民的心理创伤与精神困境更令人唏嘘。从全书以增补与缺失为叙事要素的整体架构而言,《慢人》对老照片的真伪之争及其背后的现实镜像的透视,最终实现了残疾主体、叙事权威以及移民身份三者的多维并轨。

《慢人》是一部慢书、残书,更是一部需要慢读、重读、细读的震撼之作,其意义绝非元小说技巧这一单一的阐释维度所能一言以蔽之。在传统的残疾表征模式中,残疾主体的独特性总是被主流社会的“清除”(erasure)机制所同化和消音,而库切拒绝这种社会层面与书写层面的话语统辖与意义闭合,通过文本实验和对他者性的关注在读者心中制造强烈的不

安之感(Hall, 178)。除了观照当代老年残疾主体和移民群体的真实境遇,小说在几乎无大事发生的缓慢叙述中埋设了各种无解的未定因素,如布兰卡是否偷了珠宝店的首饰、科斯特洛为雷蒙特安排的玛丽安娜是否是个骗局、玛丽安娜和丈夫的争吵是否属实、雷蒙特遗失的照片是否可能还在柜子里以及雷蒙特与科斯特洛何去何从的开放式结局,这些文本的不确定性就像《福》(Foe, 1986)中被割舌而沉默的星期五一样,永远处于意义缺失与叙述空白的不可知状态。科斯特洛曾向人物抱怨,这一切不愉快都源自“什么都没发生。四个人在四个角落里,自怨自艾,就像贝克特笔下的流浪汉,我在中间,消耗时间,也被时间消耗”(141)。这部无事发生、看似无趣的贝克特式小说,将身体的残缺之失与传统叙事模式的解构相联结,借由主人公的移民身份将目光投注到澳大利亚当代移民的失根苦难,在一种歧路横生、破碎缓慢的阈限情境中不断昭示小说艺术对未知之物的伦理见证与无限探索。

参考文献

- [1] Attwell, David. *J. M. Coetzee and the Life of Writing: Face to Face with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15.
- [2] Boehmer, Elleke. "J. M. Coetzee's Australian Realism." *Strong Opinions: J. M. Coetzee and the Authority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Eds. Chris Danta, Sue Kossew, and Julian Murphet. New York: Continuum, 2011.3-18.
- [3] Coetzee, J. M.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4] Coetzee, J. M. *Slow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2005.
- [5] Davidson, Michael. "Introduction: Dialectics of Dependency." *Journal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Disability Studies*, 1.2(2007): i-vi.
- [6] Eagleton, Terry. "A Slow Redemption." *The Lancet*, 366.3(2005): 1917-1918.
- [7] Hall, Alice. *Disability and Modern Fiction: Faulkner, Morrison, Coetzee an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8] Kannemeyer, J. C. *J. M. Coetzee: A Life in Writing*. Trans. Michiel Heyns. Melbourne: Scribe, 2012.
- [9] Kristeva, Julia.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0] Lanchester, John. "A Will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7 November 2011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05/11/17/a-will-of-his-own/>> (accessed 2020-7-12)
- [11] Powers, Donald. "Emigration and Photography in J. M. Coetzee's *Slow Man*."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49.4(2013): 458-469.
- [12]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London: Granta, 1991.
- [13] Wicomb, Zoë. "Slow Man and the Real: A Lesson in Reading and Writing."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25.4(2009): 7-24.
- [14] 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 [15] 瓦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16] 赵毅衡.分层,跨层,回旋跨层——一个广义叙述学问题.《社会科学家》,2013(12): 143-150.